

烏拉圭軍事政變與南美政治動向

王建勛

壹 烏國軍事政變

位於南美大國阿根廷與巴西之間的烏拉圭，曾因經濟繁榮、政治進步、社會福利發達，在國際間享有南美「樂園」的聲譽。但是自一九六六年以來，由於逐漸惡化的經濟危機與共黨動亂，烏國的政治與社會都陷於混亂，而最近終於爆發了軍事政變。

一、經濟危機

以其經濟而言，烏拉圭曾依靠畜牧業的繁榮而致富。至一九五一年，傳統的畜牧業生產輸出的「單一經濟政策」，已不足以配合國際貿易的競爭，而開始走向下坡。一九六五年，因畜牧業不求改進，產品更難在國際市場競爭，且畜牧產品輸出價格劇降，烏國經濟發展陷於停滯狀態，畜牧業以外的各項生產亦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投資減少、資金外流，隨之通貨不斷膨脹。從吉斯提杜（Oscar Gestido）至帕西哥（José Pacheco Areco）總統①，雖採行了「緊急安全措施」，仍未能使烏國跳出經濟危機的泥淖。一九七二年三月就職的波達柏瑞（Juan Maria Bordaberry）總統，仍面臨同樣困難；在其就職總統一年期間，比索（Peso）已五次貶值，物價上升了百分之六十，更難以扭轉經濟惡化的情勢。

烏拉圭農業的衰落，主要是長久以來，農牧業沒有良好的發展。當前烏國農業結構仍未有何改革，少數地主控制着大部份的可耕地。土地開發不足，農地僅佔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八，其中大半是地勢低窪的草原，只能飼養牛羊。沿着波拉達河（Rio de la Plata）一帶土地比較肥沃，但因開發不足，肥料與灌溉均受限制，生產難以增加。農牧業的落後，促使農村人

口大量湧向城市；一九七二年全國三百萬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居住在都市，首都蒙特維多即擁有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農牧業生產衰落與貿易赤字增加，社會福利制度已無法維持。首先是不斷惡化中的國家財政，難以維持城市中的大規模失業。烏拉圭全國只有一百萬人在工作，他們必須負擔其他四十萬領退休金者的生活。工人生活失去保障，學生因無出路而感徬徨，他們的思想日趨偏激，即成爲社會騷亂的根源。

二、共黨動亂

烏國共黨原屬合法政黨，近年勞工與學生運動均爲共黨所操縱，罷工與示威接連不斷，使社會基礎發生動搖。主張武裝鬥爭的共黨秘密組織——「杜巴馬露斯」（Tupamaros）乘機在首都蒙特維多實行暴亂。在南美洲而言，烏國共黨城市暴亂，已被其他國家的共黨暴亂份子視爲模範。他們在首都實行暗殺、搶劫、綁架，並在街頭進行游擊戰。一九七〇年八月，「杜巴馬露斯」的頭子桑地柯（Raul Sandic）被捕，但不久他即夥同五名囚犯從 Punta Carreñas 監獄中逃脫。一九七二年共黨暴亂份子發動攤牌式的進攻；炸彈、搶劫、放火、佔領無線電台對全國人民廣播。他們曾在街頭與警察巷戰，並按照他們的黑名單槍殺與政府軍隊和警察有關人員。近兩年來，他們已綁架了二十名外交官及具有聲望的烏拉圭人，更製造空前震動。他們猖獗的恐怖行動曾使警察和法官喪胆，所到之處常使警察聞風遠逃。所以波達柏瑞總統不得不借重軍隊的力量，自此，軍方勢力的擴張，逐漸對國家政治實行干預。

三、軍事政變

烏拉圭與許多南美國家不同，從十九世紀以來，始終維護民主政體，軍人從不干預國家政治。但是從一九六六年，由於經濟衰退與社會不安，烏拉圭乃廢棄了九人委員會的合議政體，回到總統集權制。此後左派勢力擴張，執政的科羅拉多黨（Colorado）內部分裂成左右兩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大選，是在共黨發動「左派擴大陣線」所籠罩的緊張氣氛中進行，科黨總統候選人波達柏瑞僅以少數票險勝。黨爭之轉劇，國會之專權，波達柏瑞就任總統以後，即不斷與國會衝突，而喪失不少的權力。面對經濟危機與共黨動亂，波達柏瑞遂借重軍方的力量。一九七二年四月，首都蒙特維多共黨恐怖份子與警察巷戰，造成十四人死亡。隨着此一流血事件，烏國進入了戰時狀態，軍方已控制了整個局面。

一九七二年九月，有陸空軍五百名軍官成立「調查委員會」，發動反「政治腐化運動」。十月拘捕七十名政府官員及國會議員，科羅拉多黨左翼領袖巴特爾（Jorge Batlle）亦同時被捕②。

烏國國會為防制軍方對政治干預，亦不斷向波達柏瑞總統施加壓力；一九七三年一月，參議院通過加強人民自由權利的憲法改革案，以擴張國會的權力。此外，國會中的左派份子企圖修改選舉法，仿做法國的制度使大選改為兩次投票。這些都使得波達柏瑞總統感到非常困擾。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二日，一批陸空軍官不滿府會間的衝突與政黨的傾軋，乃企圖發動政變③。波達柏瑞總統受到海軍的支持與叛軍談判，最後波達柏瑞總統接受政治改革為條件，暫時維持了憲政的體制。但是國會認為軍方舉措跋扈，壓迫波達柏瑞總統不要接受軍方的條件，因而六月廿九日，陸空軍再起政變，迫使波達柏瑞總統解散了國會及十九省議會④。政變以後，軍方聲明國會妨礙了他們阻止左翼顛覆的鬥爭，並指責國會妨礙了有效率的政府。然後在軍方安排下成立排除所有左派的「國家委員會」，以取代國會的立法工作，而結束了烏國的民主政治，進入半軍事統治的狀態。

貳 南美軍事政變之演變

在十九世紀初期，南美各地反殖民的獨立運動初起，當時軍隊均效忠王室，而與革命軍血戰，一八一〇年時，南美已無一片安寧之地。一八七一年

巴西、阿根廷及烏拉圭聯合對巴拉圭的戰爭，使奮勇爭取獨立的巴拉圭傷亡慘重；一八九一年智利的內戰，亦是由於效忠王室的殘餘軍人勢力反對巴拉瑪斯達（Balmaceda）的共和政府。這些軍人的目標所保持着對廣大地區的影響，曾長久的使歐洲的勢力仍舊保留它們在南美洲的商業利益。

南美洲的獨立運動，因獲得美國物質與精神的援助，遂先後成功。但是自一九一〇年以後，南美洲的軍人由爭取國家獨立與自由的目標而轉為向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並且至一九一四年，所有外國的援助與軍事現代化的教育，使南美各國軍隊發生很大變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特別是大戰結束以後，南美各國的軍人為要爭取國家經濟的獨立，經常的發起革命。因而「民族主義」即成為軍人領導國家政治的一種象徵。例如一九二七年，智利埃巴尼茲（Ibáñez）將軍受到青年軍官的支持而執政，其所強調的即是國家經濟獨立。祇是到了一九三二年，軍中發生分裂，左派的空軍司令哥拉佛（Marmaduke Grove）發動政變，成立短暫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當時「埃巴尼茲主義」（Ibanista）的左派，就是智利「社會主義黨」的前身，而今已執政的「馬克斯主義」。巴西在一九二二年發生軍事叛亂；陸軍軍官貝斯地（Luis Carlos Prestes）在農業落後地區 Seto 領導軍人起義，主張軍人領導國家經濟與社會的改革，後因無法獲得農民的支持，而轉入城市，支持反對瓦哥斯（Vargas）獨裁的「自由主義運動」。一九三四年反對瓦哥斯獨裁運動失敗以後，貝斯地即傾向了共產主義，不久他即成為巴西共黨的書記。而一九六四年出任軍事政變以後的第一任總統戴西華（Costa e Silva），即曾是當時貝斯地初期的伙伴。

一九五〇年以後由於美國私人資本的擴張，亦影響南美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發生很大變化。「保護國家的利益」又成為軍人的重要任務之一。例如一九五〇年間，美國在國際間的投資是一百一十億美元；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三百二十億美元；一九六五年又增加到四百九十億美元；一九六九年即高達七百億美元。歐洲與加拿大當然是美國主要的投資地區，但是美國在南美洲的投資亦相對的增加；從一九六〇年的八十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一百卅億美元。雖然從一九七〇年以後，美國在南美洲的投資已逐漸減少，但美國在南美洲所獲得的利潤則較其他地區為高；一九六七年美國在南美洲所獲利潤是百分之十，即一百億美元可獲利潤十億美元。而同年美國在歐洲的投資，

三百廿億美元只獲十八億美元的利潤^⑤。另一方面，南美各國在一九六〇年，亦因美國貿易的擴張，而使其在歐洲的市場遭遇困難，當南美各國輸出轉向美國的時候，又因美國保護關稅政策，而遭到損失，於是南美各國的經濟普遍惡化^⑥。尤其是古巴赤化以後，南美各地所引發的共黨游擊戰，均蒙受共黨顛覆的威脅。所以面對共黨藉口反對「資本主義」侵略，其所製造成日趨嚴重的政治與社會混亂，必須要藉保護國家利益來解除可能遭受到的顛覆危機，因而軍人即成爲維護國家安全的唯一力量。

所以從一九六四年，南美各國的軍人，不僅要長期實行軍事統治，並且還有國家整體發展的長期目標。一九六四年巴西軍事政變；一九六五年玻利維亞軍事政變；一九六六年阿根廷軍事政變；一九六八年祕魯軍事政變；一九七〇年厄瓜多爾軍事政變以及最近的烏拉圭軍事政變，均是同一時代並且有相同性質的產物。但是所應注意的是雖然它們政變的性質相同，而在他們軍事教育上所強調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理論及其實行的方法並不一樣。例如：一九六四年的巴西軍事政變，反對古拉政府左傾，防制共黨顛覆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巴西軍事政府在經濟發展上仍接受美國「資本主義」的路線，因而迄今巴西雖仍未能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但却在工業化的路途上獲得良好發展。其原因乃是巴西的「軍事作戰學校」的教育是承襲歐洲的傳統，且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巴西軍事教育已普遍接納了國際機構所強調的「低度開發國家的各項困難問題」。由於「地緣政治」的理論已成爲軍事最高指導原則，在反對共產主義方面，首先即是拯救國家的落後，要以工業化的發展使國家從落後中突出。

但是在一九六八年祕魯的軍事政變却是另外一種表現。祕魯軍方是經過長期準備而取得政權。遠在一九三二年哥倫比亞內戰之際，祕魯軍方即開始干預國家政治，一九四〇年以後，祕魯的社會不能改革，政治又不穩定，更激發了軍方不滿的情緒。經過一九五二年玻利維亞革命的衝擊，一九五五年，「保護國家利益以達成全民福利」的理論，已成爲祕魯軍事教育的基礎。所以一九六八年祕魯的軍事政變以後首先即推行國有化運動，這亦是南美「國家主義」興起的另一種象徵。

一般都認爲巴西軍方接受「資本主義」而從事工業化發展是右傾的表現，而祕魯軍方以「國有化運動」排斥美國資本是趨向左傾。這兩種不同的方

法，對南美各國同時發生了影響，不僅南美各國的軍人分爲所謂「保守」與「激進」的對立，而軍事政變的前仆後繼，相互激盪，已使南美洲的一些國家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上徘徊。就如一九六五年玻利維亞的軍事政變，陸軍司令巴潤托(Rene Barrientos Irtuna)推翻巴斯(Victor Paz)的文人政府而執政。一九六九年，由於「礦產國有化」的爭論，奧阮杜(Alfredo Ovando)將軍推翻接替巴潤托而執政的席雷斯(Adolfo Siles Salinas)政府。奧阮杜軍事政府實行礦產國有化，其所招致的美國經濟制裁，不僅社會無法改革，國家財政更爲困難，因而軍中左右兩派對立，鬥爭愈形尖銳，而一再發生政變；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右派的米蘭德將軍奪得政權，僅數小時，以陸軍司令托列斯(Juan Jose Torres)爲首的左派軍人即發動政變。托列斯企圖建立民族主義的「人民政府」，並發動「反美運動」，至一九七一年八月，右派的班瑟將軍(Hugo Banzer)又發動政變，推翻托列斯，成立右傾的政府。但是當前班瑟政府仍經常遭到左派軍人的反抗，而使政治時露危機。

叁 南美政治動向

很明顯的，近年南美國家大多數都面臨着經濟危機與共黨動亂。軍事政變固然是要消滅共產主義，但亦要保證社會與政治的革新。以烏拉圭而言，過渡的自由主義制度，國會的權限已超出了總統。受共黨操縱的工會仍依據歐洲的傳統追求「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想。政府沒有經濟發展計劃，長時期輸出仍以農產品爲主，並且愈來愈小的市場。「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的盛行，面對一個極其落後的農業機構，因而反美風潮與不滿「寡頭政治」的領導，「中產階級」亦發生了動搖。自一九六六年共黨擴大城市暴亂以來，鄰國巴西極力阻止烏拉圭可能走向「社會主義」，而國會議員及各政黨深受民主自由理論的影響，又不容許「法西斯主義」獨裁。在這種情況之下，倚靠軍事力量來挽救各種危機就難避免了。

長久以來，美國私人資本的擴張，以及南美國家的開發必須依賴美國的援助，而形成美洲國家間複雜的經濟關係。尤其近年來，南美國家，往往它們的經濟計劃必須要看美國可能援助的數字而定。同樣的從巴西到烏拉圭，

軍方的態度往往亦受到美國軍事援助的影響。這種情況今天已使華盛頓的財政活動與南美國家反應成爲確立相互關係重要關鍵。這些影響，從那些面臨重重困難的南美國家不斷走向軍事統治中不難找到例證。一般而言，美國對外援助可分爲軍事援助、經濟援助與道義援助三種。近年美國的援助，大部份是注重西半球的安全，而經濟援助卻不斷削減^⑦。至一九七〇年，美援總署(AID)對拉丁美洲的經濟援助只有四千一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再爲減少爲一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七三年稍有提高爲二千八百萬美元。就以烏拉圭而言，美國對烏拉圭的軍事援助，從一九六六年不斷增加；一九七〇年是一百一十萬美元；一九七一年是五百五十萬美元；一九七三年是四百萬美元，因而烏拉圭走得能維持一萬二千人的軍隊裝備及軍事訓練，以担负防制共黨顛覆的任務。但是在經濟援助方面，從一九六六年以來卻不斷削減，至一九七二年只剩下九十萬美元。

所以南美各國的軍事政變，其反共態度均極明顯，祇是當它們無法挽救的經濟危機不能獲得美國更多幫助的時候，在「民族主義」風潮之下，容易

從萬隆暴動看毛共陰謀

張耀秋

一 萬隆發生暴動事件

印尼西爪哇首都萬隆，於八月五日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反華暴動，參加暴動的羣衆共達十五萬人，據外電報導：一名華人當場喪生，二百五十餘人受傷，一千一百七十二間華人經營的商店及住宅遭受損害，五百多輛汽車及機車被焚，造成人員與物資的鉅大損失，財產損失據估計超過二百五十萬美元。一九六二年時曾發生過一次反華流血暴動，但此次則遠較上次爲重大。

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據外電報導是由於一名華人司機和一名印尼板車夫的偶然爭吵及打架，如此的事件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本是極爲平常的事，可是在印尼華、印兩族之間，如此一件小事故，竟引起印尼人如此大規模的反華暴動。這次事件之所以發生，窮根究源，實由於部份印尼人對一般華

使它們在「國家主義」目標上避免私人資本所造成社會鬥爭的趨向。由是本年五月，當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訪問中南美國家中，已重申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在他與南美國家討論了在國防與經濟方面問題以後，表示美國在越南停火以後，能夠增加對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⑧。

註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吉斯提杜總統因心臟病去世，因而副總統帕西哥接替了總統職位。

註② Oct. 1972 Le monde diplomatique.

註③ 16 Feb. 1973, New York Times.

註④ 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七日美聯社電。

註⑤ 1, Apl. 1973, Le Nouvel Observateur: Amerique Latine;

A Quoi Servent Ces Generaux?

註⑥ 參閱拙著「認識中南美洲」一書第六十八頁。

註⑦ 同(註六)第六十九頁。

註⑧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法新社電。

人的嫉嫉與仇視。印尼華僑大約有三百五十萬人，由於工作勤勞，大多生活富裕，一部份人且擅陶朱之術，對印尼經濟舉足輕重。而大多數印尼人則都是貧窮落後，兩相對比，兩族貧富差距格外顯著，而部份印尼人不想振作，祇於有意無意中將他們貧窮的原因歸咎於華人的富有。

印尼共黨是在毛共領導之下從事活動，其爪哇常利用華僑華裔與當地人民間的某些差距，作爲挑撥分化的口實，如華人掌握部份工商事業，勤勞儉樸，生活情況較當地若干人爲優裕，及當地對華人從事某些商業限制的禁令，共黨份子乃儘量加以煽動離間，使雙方互相仇視，製造裂痕，擴大矛盾，一遇時機到來，更不惜煽起騷亂，破壞社會安寧，直接打擊善良的華人，間接亦是向印尼政府的威信挑戰。

這次萬隆暴動被裏脅搗亂羣衆的人數達十五萬人，且是趁一部份治安人